

办卡记(散文)

□ 包倬

六十岁,母亲终于可以每月领取一百元养老金。我说终于,并非浮夸之辞。多少农民逐年缴纳社保,就是在等这一天。所以,我们村的人管这叫“老人钱”。

七八年前,母亲已经告别土地,随妹妹生活在长江边上的重庆。从山里到江边,从鸡鸣犬吠到车水马龙,看似是享福,实则是屈服。她得学习乘坐电梯和地铁,学习和小区里的大妈们跳广场舞和远足,学习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育儿方式以及重新审视一个家庭的清洁卫生。这些她都学会了,但仍然放不下凉山深处的老家。

老家还有破屋九间。真是破屋,像一片在风雨雷面前瑟瑟发抖的枯叶。下雪的时候,我请人拍了老屋的照片发来,朋友们说,看着挺童话的。我不觉得那是童话,而是范成大的“昼出耘田夜绩麻,村庄儿女各当家”。确实,在老屋的四周,住着我的亲戚们。远在重庆的母亲,凭着一部手机,硬是将亲戚邻居们的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,搞得一清二楚。

当然,偶尔也有不是亲戚的人打来电话。比如那个通知她去办卡接收养老金的生活队长。卡即社保卡,有银行卡和医保卡的双重功能。村里早年统一发过卡,但因母亲没在乡下,未去激活,从而影响了养老金发放。

腊月二十二,母亲从重庆坐高铁到昆明。我去接站。见面第一句话,便是要我在春节前抽空载她回老家县城处理社保卡问题。昆明距会东,行程不足三百公里,但开车需要四个小时。我在心里算了一笔账:每月一百元,每年一千二;开会昆往返,油钱、过路费和吃喝,加起来也得大几百元。当她再次要求时,我把这账算给她听。而她给我算了另一笔账。

“从包产到户起,我每年上交公、提留款,还有生猪。如今我每月领一百元,难道不应该?而且,虽说十几年前免了农业税,但我同时一直在缴社保金。”

“我没说不应该,是说不划算。”

“该是我的,我一分钱都要拿到。”

我答应了她。因为这并不仅仅是一百元的事。经她提醒,我也想起了童年时她和父亲去镇上交公粮的情景。那是一段两头黑的路。父母天不亮出发,我们兄妹三人巴望着村口,天黑时能迎来两团疲惫的身影和几颗水果糖。我从小就知道,交公粮要看粮站同志的心情。他心情好,父母当天能回来;他心情不好,那就还需要一两盒金沙江香烟加持,我的父母才能当天回来。

从昆明去会东,我们也打算当天往返。为确保万无一失,我提前一天联系在老家县城工作的同学,再三确认银行职员上下班时间,并将一天的时间作了精确划分:去程四小时,回程四小时,吃饭两小时,办事五小时。所以,我们得在早上六点从昆明出发。

天未明,不知阴晴。中国结样式的路灯亮着,有点过年的样子了。母亲坐副驾

位,她说这样不会晕车。我对此表示怀疑——我见过她坐长途大巴吐得如大病未愈的样子。因为怕呕吐,出发前她不敢吃早点。

我有多久没有认真跟母亲聊天了?我大字不识、忍辱负重的母亲。这些年我们天各一方,她总在我生日的时候发来语音,“今天你长尾巴了。”多少人在我生命中来去,从来没有一个人像她一样记住我生日。从来没有。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,她是了解我的。关于人间是非,她说,“别听他们的。你是什么样的人,我最知道。”

二〇二三年腊月二十五,我和母亲从昆明开车回凉山。出昆明,经禄劝,过乌东德,进入会东地界。起初,天地一片黑暗,只有车灯一闪而过。后来,天亮了,车窗外是绿色的山岗和灰白色的村庄。蓝色路牌显示,我们经过的村庄叫罗万德、罗万斗、以老南以及以书卧。这些是可以进入文学世界的村庄。

每走一段,我便问她有没有感觉晕车?她始终摇头。是因为聊天分散了注意力,还是儿子驾车让她有了安全感?我不得而知。总之,四个小时,我们母子一直在说话。这是多么幸福的事。这一路上,我们聊的无非是一个家庭的过去和现在。她的角色永远是妻子和母亲,像老屋的大梁和柱子。

从云南进入四川,中间隔着金沙江。乌东德,江水已被大坝阻隔,无数人的故乡在水下。这条江向前流,在一百多公里外的白鹤滩,江水再次被隔断。巧家人的房子上,有我母亲卖去的椽子。是那些椽子,让我学得汉字,并沿用至今,成为了一名写作者。

母亲当然不知道作家是何物。但她知道,她的儿女已离开了村庄,不再像她一样伺候庄稼。作为母亲,她早已功德圆满。可她仍然心存遗憾。“要是多上几年学,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辛苦了。”她说。知儿苦者,莫过于母。

进入会东,便是故乡。云南被甩在身后,成为了“江那边”。自从去到重庆,母亲再未回过四川。七八年,她已成为标准的游子。她不知道汉语里有个词叫:近乡情怯。但是谈及窗外的事物时,声音在发抖。“这些石榴,多么好,”她说。事实上,秋天早已过去,她说的不是石榴,而是插着巨大招牌的果园。好,是对世界万物的最高褒扬。

四十分钟以外的县城,我的堂妹在等着。她想见多年未见的大妈。她在银行里取了号,并打听清楚了办事流程。郑重其事。不能有任何闪失。这一程不易,我们都不知道母亲下一次回来是猴年马月。

会东,会理的东边之县,旅游画册上称其为“金沙明珠”。但实际上,这里离金沙江其实远了点。广袤的土地上生长着烟草、中药、石榴、甘蔗,以及不知疲倦的农民和黑山羊。在这人潮涌动的小城里,饭店、茶室和KTV生意兴隆。人们贪吃好耍,慷慨耿直。

我想象过年关将近的县城,但还是没

料到它会如此拥挤。除了车,便是人,像一个热闹的大集市、大蜂巢。而银行如我想象的那般拥挤。二三十人共聚一厅,空气浑浊,喧闹嘈杂。母亲和堂妹在排队,亦步亦趋,小心翼翼。真的是小心翼翼。我甚至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。什么文学、世界局势、人工智能、食品安全,统统滚一边去。神啊,保佑我们顺利吧。自从进入县城,我便是一个卑微的办事农民。

点钞机运转不停。崭新的钞票大受欢迎。要不了几天,这些现金就会出现在牌桌上和红包里,成为另一个人的囊中之物。有人要取二十万,银行职员不给办理,理由是没有预约。问:取那么多钱干啥?答:娶儿媳妇。我心里一乐,但随即又涌起酸楚。那是一个朴素的母亲,汉语并不流利。她据理力争无果,只能预约改日再来。

终于轮到我們。该死的紧张感又出现了。甚至有那么几秒钟,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问题。我向玻璃柜台里递去那张打进不了养老金的社保卡,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通。终于,办事员将卡放到了感应器上。

“完善一下资料就可以了。”她说。

“就这么简单?”我问。

“是的,她的资料不全。”

电话号码、家庭住址、现住址,填了一通,卡被退了回来。可以了?应该可以了。应该?嗯,下一个。

我们如释重负。原来,令母亲寝食难安的大事,竟然如此简单。中午11:50,正是饭点。大概是因为太顺利,或者是银行职员的语气让我们产生了怀疑。我们在饭桌上提出了一个问题:如何证明这是一张已经激活的卡片?万一没有办好,这一趟岂不白跑?堂妹说,你向这卡里转一百块进去不就知道了?她可真聪明。我转了钱,三秒钟内被退回,理由是:账户异常。于是,饭桌上的氛围中多了焦虑和猜测。但能怎样?只能寄望于下午的三个小时了。

下午我们换了个银行网点。又是如此这般地一通说明,卡片再次被放到感应器上。

“这是一张废卡,三年前就已经被注销了。”

原来如此。这是更符合逻辑的解释。

“那就重新办一张呗。”

“是需要重办。但我们今天没卡。”

“是你们网点没卡,还是整个县城的所有网点都没卡?”

“这不好说。”

这时,我弟媳也背着孩子来了。为了办这张卡,我们出动了老少五人。母亲满脸的焦虑失望,但并未说出来。我们决定重回上午那个网点。而等待我们的,是长长的队伍。

“走了,妈。”我说,“咱不要这点钱了。”

“来都来了,耐心点。”她说,站到了队伍后面。

终于又轮到我們。我的愤怒取代了紧张,而母亲依然是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。这张卡第三次被放到感应器上,并再次被确认:已经注销了。

“那就重新办一张呗。”

“嗯,好,你先去移动大楼做一个手机号的实名认证。”

于是兵分两路。弟媳和母亲留在银行,我和堂妹去移动大楼。等待我们的依然是长长的队伍。问询。取号。前面还有34人。我走到外面抽了支烟。下午三点半,太阳明晃晃地照着小城。人间繁忙,我心如焚。突然想起一个发小,其妻在移动大楼工作。打电话过去求助,得知他妻子正在休产假。又说其妹在移动大楼对面开手机店,也许能帮上忙。柳暗花明,三分钟以后,我们拿到了一张印有母亲姓名和电话号码的缴费发票。

回到银行,我母亲仍然排在队伍里。下一个就轮到她了。开户。填表。摄像。设置密码。确认。再次确认。然后,一张农村信用社的储蓄卡就办成了。这一次,毋庸置疑,这卡能用了。可要将它变成一张社保卡,还需要去医保局添加功能。

下午四点半,我收到来自四川交警的挪车警告。四川交规令人闻风丧胆,我见识过。距离医保局下班还有半小时,万里长城还差最后一块砖。我快崩溃了。堂妹让我去挪车,她骑车载母亲去办这最后一道程序。汽车和电动车之间,一直在通话,实时播报。

“人不算多。”

“需要户口册。”

“哦,不对,有身份证就可以。”

“办好了。盖了章,打上了照片。”

……

挂了电话,我靠在驾驶座上,眼窝发热。我的母亲终于可以每月领一百元养老金。这真是一件大事,对她来说。晚饭期间,我试图为母亲绑定医保亲情账户,又失败了,理由是“年龄差距小于18岁”。这当然不能怪医保系统,因为他们并不知道,母亲在她17岁那年给了我生命。

作者简介



包倬,1980年生于四川凉山,2002年开始写作。发表有长篇小说《青山隐》,出版有小说集《沉默》《十寻》《路边的西西弗斯》等。曾获云南文学奖、长江文艺双年奖等。现居昆明。